

党史资料选辑

东莞烽火

第 5 册

中共东莞县委党史研究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东莞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东莞烽火

第五册

中共东莞县委党史研究小组办公室
中共东莞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前 言

《东莞烽火》第五册今天出版了。这一册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三周年，特意选辑了一部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县党组织从事各种秘密斗争的史料。

它记载了我县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开展各种秘密斗争的情况。有钟育民同志的《水乡地下区委》、尹平同志的《艰苦战斗的八年》、黄克同志的《清塘地区的地下斗争》、容克同志的《北撤前后》等老同志的革命回忆，以及《东莞党组织的恢复和东莞中心县委的成立》、《东宝边区工委》、《抗战时期东莞财税战线的斗争》等专题文章共二十四篇。

回顾我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所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是为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振奋革命精神，更好地促进我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由于我们的人力和水平有限，编写的专题史料难免有错漏之处，希望各位革命前辈批评指正并多提补充修改意见。

编 者

一九八四年七月

目 录

艰苦战斗的八年	尹 平 (1)
清塘地区的地下斗争	黄 克 (12)
北撤前后	容 克 (19)
战斗在东莞的十二个春秋	杨 培 (22)
地下斗争的回顾	方 东 (30)
水乡地下区委	<u>钟育民</u> (50)
抗战开始的东莞救亡运动	王棠棣 (53)
从地下党到民主政权的斗争	卢 淦 (60)
在莞城敌人眼皮底下斗争	李 顺 (67)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的回忆	邓绍明 (70)
沦陷区的学生运动	(75)
新一区组工队	朱 善 (80)
梅塘地区革命斗争的回忆	陈 程 (86)
卖柴侦察、夜袭篁村	黄 布 (103)
绑蛇	黄 琴 (110)
接待站	袁鉴文 (118)
战斗在老虎巢穴里	方 烈 (130)
镇压土匪头，振奋我军威	周 桃 (137)
中青在东莞的发展及其历史意义	(141)
东莞党组织的恢复和东莞中心县委的成立	(150)
东宝边区工委	(165)
杜屋风云	(171)
抗战时期东莞财税战线的斗争	(179)
梦黄献群同志	<u>谢阳光</u> (189)

艰苦战斗的八年

——尹 平 口述

怀念战友

一九三八年八月，我在东莞中学读到第五个学期，就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十月，日寇在大亚湾登陆后，我与同班同学黎英（黎永瑜）、刘清、李兆来、刘永亨、樊炳坤等十三人（到解放战争胜利，只剩下四人）一齐参加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在我的十三位同学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刘永亨和樊炳坤。他们是我的战友，早期为革命牺牲了，使我难于忘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刘永亨，东莞县道滘人。他为了抗日，参加了“模范队”。但父母思想不通，想方设法要他回家。他坚决不从，于是家里算了一条计策，说母亲病重，雇了一条艇运到莞城，要他去看一下。他出于对母亲的感情，依时来到省渡头河边，突然跳出几条大汉，不容分说，把他捉上艇，运回道滘。父母把他关在家里，钱、物都收藏好，并在生活上十分关怀体贴，为的是不让他去当“老嫖”。但他革命意志坚定，过了几天，见父母不在家，便趁机逃了出来，还把父亲的怀表拿走。因为那时在部队要靠大家捐献，掏钱吃饭。他跑到飞鹅，回到部队，与我工作和生活在一起，晚上同睡，早上一块儿跑步，锻炼身体，一起随宣传队下乡宣传抗日，演讲、唱歌、演话剧，工作非常积极，一心抗日。可是工作

劳累，生活艰苦，水土不服，病倒了。初时由我照料，后来，我要执行任务，要往别处了，临别我们都依依不舍。过了十多天，我出发归来，见不到他了，他因缺医少药已经病逝！谁会料到，我们这次一别，竟变成永别，我多么伤心难过啊！

另一位是樊炳坤，又名樊洪，莞城镇人，其家开木展店，与我是邻居。他为人忠诚朴实，沉默寡言。我们从小要好，互相关心爱护，经常出入一对。为了将来打游击抗日，我们经常长跑，往往一跑便是几十华里，锻炼了腿力；我们知道游击队生活艰苦，经常吃不上饭，我们就故意挨饿；我们还学武术，筹款买步枪子弹，到河边练习射击，提高杀敌本领，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好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后来他参加常备队了，在榴花战斗中，表现得非常英勇，他虽然负了伤，当日寇骑兵队冲过来时，他勇猛地拉住一只马的马脚，欲把敌人拉下马，但给敌人的马刀砍倒，壮烈牺牲了。

后来，东莞县军民，为榴花战斗牺牲的烈士在公园举行追悼会。肃穆的大会场，摆着一排棺材，由壮常队政训员何与成主持了追悼会。他神情庄重，在会上讲话，语调悲愤激昂，刹时会场上掀起了抗日热潮。我也参加了追悼会，心情非常悲痛，更激起我对日寇的无比愤恨，决心为战友报仇，打败日寇侵略者。

抗 日 救 亡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石龙沦陷，莞城等地形势紧张，人心惶惶。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县委决定组织留城工作队，由祁烽同志任队长，他在各地挑选了九人组成。初

时，祁烽叫我到留城工作队，有的同学劝我不要去，怕我顶不住，我还是坚决去了，还有卢克敏、王锦枝等同志，都是点名去的。我们互不叫名字，更没有职称，一般叫代号，如祁烽称“烽哥”、王锦枝称“枝哥”、我叫“炽哥”。

留城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安定人心，宣传组织群众抗日，搞募捐，筹款支援抗日，群众集会动员捐献，逐家逐户去捐。卢克敏和我都在会上讲话，他讲得悲愤激昂，十分动人，鼓动了许多群众，慷慨解囊，支援抗日。

这时，《东莞新闻社》仍在莞城，是由何鼎华他们负责的，尚未撤走，县委书记姚永光常在新闻社出入，我们常见到他，都很尊重他，都叫他“老姚”。

莞城形势吃紧，我们撤到犬眠岭，队部没有经费，靠大家凑钱解决吃饭，我把口袋里的钱都拿出来了。在犬眠岭住了几天，日寇已经占领了莞城镇，我们准备转移到飞鹅。这时，看到逃难的人群往山区跑，老弱妇孺，拖儿带女，孩子们哇哇叫，那情景十分凄惨。在难民中，见到我母亲、妹妹和十四岁的弟弟，他们告诉我，父亲被困在莞城尚未出来，全家为他的安全耽心，小弟弟在伤心哭泣，母亲眼红红的异常难过。我劝慰了她们几句，并动员他们快跟人们走，我有公事在身，不能陪同了，并说了些要国顾不了家的道理。我母亲虽然是个文盲，但思想开通，是个颇懂事理之人，还劝我说：“阿炽，你有公事赶快去办，我们自己会走。”母亲的几句话，给我很大的鼓舞。我回到部队，向队长祁烽汇报，他也称赞应该这样。

我们在飞鹅住了两天，接到上级命令，要在飞鹅周围设

立几个据点，由袁鉴文同志负责；这时管武装的颜奇也到了，他虽然是国民党派来的，但思想比较进步，倾向于抗日，对我们也很客气。我和陈福媛被分配在同一个点，组织上只给我们两元经费，可想而知当时生活的困境。我们在傍晚出发，依靠地图指路，跑了一整夜，才摸到大岭山连平，开辟工作。不几天，接到领导通知，要我们到太公岭开会。我们马上赶到太公岭，那儿已经集中了一百多人，这时认识了“模范队”队长王作尧。他在会上作了个政治形势报告，并宣布，根据形势需要，化整为零，把队伍分散到各地做群众工作。当时有些同志思想不通，认为要集中行动，我是按照上级的布置下乡了，开展抗日宣传，这样经历了一段时间，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底，由黎英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段时间，斗争是复杂的，生活是艰苦的，有的经受不了考验，而脱队去了香港或回家做生意。我被组织安排与李兆来到了大圳埔，作为立脚点，一方面作莞太线的情报工作，监视日寇在太平与莞城的活动情况，向组织汇报。我们的联络人是张英同志，他是党支部负责人，坐镇大岭山太公岭，半个月向他汇报一次，另方面作群众工作。我开始学种田，带领李兆来什么农活都干，人们知我是个中学生能这样吃苦，顶个长工的作用，从而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与群众关系很好，在大圳埔村立下脚来，建立了一个据点。一九三九年春，蛤地一间学校开学，缺乏教师，我与李兆来到校任教，但我不懂井客家话，上课学生听不懂，我就根据赖锦章编的《客话拉丁化》进行学习，白天上课晚上学话，加上李兆来的辅导，我很快学会了，能用客家话上课。这样，与群众的语言相通，说话自如，学生家长尊重我，与群众的感情

融洽，使我们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也便利得多了。

秘 密 交 通

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月间，县委通知我回县委当交通员，陈文也是县委交通员，他比我早，然而，我也整整当了三年。县委的秘密交通，任务是繁重的，经常要把情报、文件、书籍等送到各区委、支部，甚至党员手上，就靠两条腿，日夜兼程，跑遍了山乡、水乡、城镇，跑熟了山野的羊肠小道，水网地带的泥泞路和城镇的大街小巷。所以交通员要能吃苦耐劳，而且要忠实可靠、机警沉着、胆大心细。因为交通员认识许多人，而且是重要的领导骨干，假如被敌人抓了，不坚定的话，对党带来无可估计的损失。我们做交通员的，每次出发之前，都要“三思而后行”，一是怎样安全到达目的地？二是在路上可能会碰到什么情况？三是碰到敌人怎样对付？县委书记陈铭炎亦经常这样教育我的。后来从实践中改进了，不跑这么多地区，只跟区委联系。

当时，对敌斗争既艰苦又复杂，对付几方面的敌人——日寇、伪军、土匪和国民党顽固派，无论送信件到部队或者地下党同志掩蔽的地方，都要通过日伪的沦陷区和蒋管区，甚至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所以十分危险。

大概是一九四〇年或四一年间，有一次，我从太公岭到温塘，准备与袁能同志联系。我走到将近温塘的一个拐弯处，突然发现日伪军荷枪实弹包围了温塘，还用机枪封锁路口和山道。这时，我正走在麻石路上，两旁是水田，没有掩蔽的地方！如果往回走，敌人会用机枪扫射，往两旁的水田走不成，唯有往敌人的方向走去，我手里挽着的包袱，目标

较大，里面藏有《方志敏烈士传》和《游击队战略战术问题》等书及文件，如果给敌人搜出来，那就不得了呀！怎么办？我正为难，幸好发现有个农民拿着锄头在放田水，我立刻走前去，与他交谈，边走边谈，他走前，我跟在他后面，边谈边笑，似乎很熟悉、很热情，面对前面的敌人，装得若无其事，大摇大摆的走到村前，那里有四、五个日本兵在休息，只瞟了我们一眼，以为我是当地人，没有戒意，也不搜查我们，就这样被我闯过去了，一进村，我浑身轻松，见前后无人，立刻窜入厕所，把包袱藏在草木灰里，这下才安心地去找袁能联系。

另一次，我从连平出发，经太公岭等地到天堂围，有四十多里路。去的时候，我没有携带东西，也没有发现敌情，因为任务需要我当天赶回来。我到达目的地，取了文件和书籍等，便带在身上赶路了。当天下午，我快到天堂围门口的时候，见到人来人往，才知道今日是集市日。正在走着，突然发现呵呵鸡（国民党兵）在前面检查行人，几个农民妇女蓝里的鸡蛋都给搜去了。我想这帮贼兵无非是想捞食，我便壮着胆子走上前，抢先把东西递给他检查，可能贼兵以为在我身上捞不到什么油水，没有检查，让我过去了。

又有一次，我带文件到厚街，将近到了，我考虑到这儿昨晚发生战斗，敌人一定戒备森严。因此，我立刻回头，跑了五里地远的地方，把文件藏好了才去，果然遇上了日寇的严格搜查。我想多么危险啊！不然就出问题了。

此类情况甚多，举不胜举。这就说明了交通员工作，是十分艰险的，除了对付敌人之外，还有本身工作的艰苦性，不管晴天下雨，甚至台风袭击，都要出发，但我习惯了这种

生活。我出发不担伞，也不穿鞋，只戴顶“急帽”，跋山涉水，一天跑到黑，风雨无阻，经常跑到天亮。

当时，县委书记是陈铭炎，县委机关经常在高埗、拔蛟窝，有时在石碣、江城洲，也驻过杨屋村，总之，游击生活，没有固定地点，随时转移。其他同志，如王鲁明、何鼎华常驻塘厦（东莞新闻社所在地）；张广业在高埗，也驻苦草洞；黄树楷常驻太公岭，也到高埗；王士钊在拔蛟窝，王锦枝（区委书记）常在厚街，还有黄宇在靠近惠阳的村庄等等，既然要跟他们取得联系，就要经常来回跑，路线是：塘厦——梅塘——太公岭——高埗——望牛墩——道滘。这个时期，县委机关在水乡比较多，有三个联络点：高埗、拔蛟窝、石碣。我从高埗跑到塘厦，有一百三十多华里，跑十多个小时，如果拿半个月平均计算，那我每天的行程要跑六十五华里，可能是我不穿鞋跑路，脚晒得黑黑的，同志们给我起了个外号“火炭脚”，我和陈文一起当交通有一年多，我们为了赶路，吃饭没有时候，到哪里吃到哪里，睡无时间，更谈不上身上的卫生了，所以生虱子、长疥疮，怪难受的。

但是，我们认识到这项工作十分重要而光荣，从来没有叫过苦。党的领导对我们十分关怀，同志们对我很爱护，百姓与我们亲如手足，每当我出发到一个地方，无论见到上级领导、同志们或者阿叔阿伯、老太太，只要对上暗号，那亲热劲儿，使我难忘，仿佛忘记途中的劳累。有一次，我到塘厦（新闻社），何鼎华十分亲热的接待我，搞了点好吃的，亲自招呼我：“炽哥，快吃。”我已经吃了三碗，算是已经特别能吃了，他还劝我吃。真是领导的关怀，给我很大的鼓舞。

我除了带信，回到县委机关，遇上开会，集中二十多人，我们就主动承担杂务，当炊事员，买米、打柴，样样干。有时，县委同志也来动手，我们就争着先干，不给他们插手，因为领导工作很忙，让他们更多的时间考虑全面的工作。

地 下 区 委

一九四一年秋冬间，我调到水乡做地下工作，我在袁屋，曾玲在刘屋，都是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进行党支部建设，发展党员。初时，有的学生看不起我，在我上课时很嘈杂，但不到一个月，变得很静了，认真听我讲课，师生关系融洽，家长们都觉得惊奇，称赞教师有办法。从而，我在群众中有了威信，把我当作亲人了；同时，人们还认为我朋友多、交游广，社会上有人士，还把我当教师赚来的一些粮食，供人吃饭，从不计较，真是慷慨大方，是个有志气之人！其实，经常与我来往的，都是我们的同志，那一般群众怎么会知道呢！

一九四三年秋，我调到厚街陈家坊，仍然以教师职业为掩护，负责四、五个党支部的工作。几个月后，陈铭炎同志通知我到他那里，交带我三天内赶到中堂小东向，另接任务。我按时到达后，住在六嫂家里，任务是秘密印发传单，全部工序只我一人完成，供外面同志去散发。我记得其中有个材料是《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几个月后，我转到东涌当教师作掩护，负责附近几个支部的工作，认识郭奖贤、李焕章等同志，祝锦龄同志也是在这个时候取得联系的。

一九四四年九月，何清、谢阳光带领队伍挺进水乡，我

被调水乡区当建政工作队队长（属水乡区委领导），后与傅冰、曾玲领导的宣传队（属部队领导）合并，改称民运队，傅冰任队长，我当副队长、支部书记，配合部队开展工作。

一九四五年四、五月间，由于形势紧张，部队撤出水乡，我也随之离开水乡，到横坑当了一段时期党支部书记。后来到二区民运队，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便调到新一区，任区委助理，陈文是区委，我协助他的工作。经过两个多月，陈文调出，我当区委组织部长，这时党政军是统一领导的，部队的政委兼任区委书记，即卢江（卢星裕）任区委书记，赵督生任区长，后卢淦接任区长。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侵吞胜利果实，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形势开始紧张了，部队要集中力量对付敌人，卢江同志有任务返部队了，王士钊同志通知我接任新一区区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区员是陈淦泉，莫儿是组织干事兼宣传干事，黄永光在大朗中心小学任校长，都是由我领导的重要骨干，在大朗地区进行工作。

艰难岁月

一九四六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的扫荡日益加紧，形势十分紧张，我和征粮队向莲花山转移。走到莲花山附近的田里，有个农民拦住我们，叫我们不要往前走，国民党军队已经包围过来了。说着，敌人已经向我们开炮，并且步步逼近，我们立刻分成几支队伍撤退。我带领二十多人，有武装人员，其中一位是连队指导员，有作战经验，而且有一挺机枪及红毛十等步枪，子弹二百多发，所以，我们决定与敌人战斗，待天黑后转移，到莲花山打游击，联络督导处，接受

行动命令。后来在后山又联络上二十多人，共五十多人，队伍大了，更有信心跟敌人干。这时，刚好接到督导处通知，要我们到莲花山集中待令。

傍晚，我们到达了莲花山，但见不到一个人影，打口哨联络，也不见回音，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十分诧异，是联络员同志通知错了我们，还是他们已经转移了呢？天已经开始黑下来了，我们决心寻找，因为在此紧要时刻，必须得到上级党的指示，才能行动。我们从山下找到山坑里，总算找到督导处的同志了。为什么他们不出来见我们？原来我们这支队伍中，有的同志穿上日本军服，他们误以为我们是敌人呢！

黑夜已经降临，山野开始肃静，只有鸟儿的归巢声和虫儿的鸣叫，把大地闹得很不安宁。此时，我们的心情，也是不能平静的。面对着艰难的岁月，残暴的敌人，我们应该怎样对付？这时，督导处副主任王士钊同志就在这山地里，召开了大队以上干部、区委紧急会议。他神情庄重，语气激愤，指出了目前敌情严重，我们是在敌人包围之中，为了甩开敌人，必须在天亮前离开此地；最后，决定要我们回新一区，李焕章、曾玲、莫儿等女同志转移去香港。会后，已经夜深了，我们分别行动。

回到新一区，我立刻动员她们出香港，但她们不愿去，我说这是组织决定啊！她们只好服从了。如今只剩下卢淦、陈淦泉和我几个人了，在敌人的空隙地带转来转去，生活十分艰苦。为避开敌人的所谓“填空题”战术，保存革命实力，我们决定分散活动。陈淦泉到望牛墩，我回莞城，忘记卢淦到哪里。

我回到莞城后，白色恐怖亦十分严重，国民党特务走狗四处乱窜，匪兵们天天搜捕，我在莞城站不住脚，转移到温塘袁善那里。经商量后，他建议我到袁炳贵家里。袁是抗日大同盟的盟员，其妻周竹亦是革命的基本群众，我们与袁炳贵研究，他也乐意掩蔽我。袁炳贵刚结婚，门前还贴了对联，我就住在这对新夫妇的家里，距离李潮匪军营地——祠堂，只一百多公尺，随时见到他们，看来很危险，其实很安全，敌人根本没有料到，我敢住在这儿。

我在温塘住了十多天，转移到别地，住了一段时期，已经是一九四六年夏天了。祁烽同志通知我，到宝四区任特派员（区委书记），地点在元朗边界。我正准备去上任，又接到王士钊同志通知我北撤。我立即动身，经香港找到联络地点，对上暗号，联系上了，然后启程到沙鱼涌集中，随东纵部队北撤山东烟台。从此，我离开了故乡和艰苦战斗八年的地方。

傅泽铭、岑治立、叶庞访问于南宁

叶 庞 整理

清塘地区的地下斗争

黄克

清塘区过去是东莞县第四区，包括樟木头、石马、清溪、塘厦、凤岗、塘沥，东从铁路起直到和惠阳交界处，是个山区丘陵地带。

我是清溪土塘人。这里从一九三七年已开始有党，有个姓黄的教员是党员，曾被国民党拘留于樟木头，后为廖承志所保释；另有个党员是张里夫同志，他是在塘沥小学当校长的，还有林锦华、黄万顺等都是党员。一九三八年又发展了张松鹤、谢乃坚、赵督生和杨培等同志，另外土桥的莫保养是在东莞的军事训练班里入党的，鲁锋是派来的。然后是我 and 黄布这一批。这时，中共东莞县委派了黄高阳和黎崇勋来这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了抗日自卫团，成立了各种救亡团体，如剧团、青年队等。张里夫是这个区的区委书记，他后来在清溪被飞机炸死了。

一九三八年初，张松鹤是东莞县自卫团第三十二大队的大队长，他当时的公开职业是鹿鸣小学教员，谢乃坚也是教员。清溪、塘厦、凤岗的青年都组织了自卫团，相当于今天的基干民兵，经常进行军事训练，当时我也参加了，这是不脱产的。而那时成立壮丁常备队则是脱产的。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占广州后再向南扫荡来到我的家乡，自卫团就活动起来了。蔡子培同志在樟木头活动，后来又把自卫团带到清溪来，又转往观澜的白花

洞。当时东莞县县委驻在樟阁，县委指示自卫团武装上山打游击，敌人占乌石岩后，我们就返回来了。

一九三九年初，王作尧同志带的模范壮丁队和各地的自卫团武装（成员大部分是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清溪苦草洞集结，成立了“东宝惠边区抗日游击队”，属下有两大队：即王作尧和黄木芬大队、蔡子培和赖锦章大队。当时还是国共合作，苦草洞和铁场是部队活动的地方，日军占领南头后，部队就开赴前线打日寇，清塘区就成为后方了。部队“东移”时，清塘区成为国民党统治区，部队“东移”回来后，国民党的大本营驻在樟木头，而国民党的第七战区第六挺进纵队的后方则驻在清溪。我党相应地采取了“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斗争形式，我从部队调到区委工作（区委书记是黄万顺），党转入地下活动，组织了兄弟会、姐妹会、游击小组（秘密的）。另方面又派出党员打入敌人内部，或把敌人内部的工作人员争取过来为我们服务。如当时国民党驻樟木头石马司令部里的上尉译电员温巩章，就是被我驻石马诊所党员周爱莲、罗慧舒（罗涛之姐）利用温巩章常来诊所看病时把他争取过来的。他是个追求进步的青年，知道国民党腐败，经我们做工作后，他就把他在译电中知道的情报准确地、迅速地转送给我们。如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员香翰屏要进攻我部队的军事部署，他全提供到诊所来，再转送到当时打入国民党塘厦区府工作的党员罗涛那里，最后交我（在土桥）送到部队去。有时也有送到石鼓李琼珍那里转、有时分两条线，即一路直送宝安的木古给王作尧同志，另一路直送到东莞的常平周屋厦转东坑，再送给曾生部队。罗涛是由当时东莞县委